

· 专题访谈 ·

编者按：冯时研究员是当代考古学、古文字学研究名家，深耕学术四十余载，孜孜以求，在中国天文考古学的创立、早期文明研究等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对增进学界深入解读华夏文明的丰富内涵、独特道路提供了有益借鉴。为此，编辑部特邀冯时研究员，畅谈秉持多学科融合理论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治学路径及独到认识，以推动学界对相关问题更多的关注和思考。

鉴史观天 探源立论

——访冯时研究员

蒋雁喃 张 凯

一、溯初心之源

问：冯老师，您好，非常荣幸能邀请到您。每位学者的研究之路想必都有着自己的故事，好奇您最初是怎样与考古结缘，从而开启您的学术生涯的呢？

冯：我最初的志趣不在于考古，而是在于古文字，可以说对古文字的热忱一直伴随我至今。我小时候学习书法，书法就涉及真、草、隶、篆等各种书体，而篆书就是古文字。所以在中学时代我就开始学习古文字了，考大学时更明确了以学习古文字为志向。古文字学在大学里通常设在两个系，一个是中文系，另一个就是历史系的考古专业。中文系对我的吸引力不大，于是我就报考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考古专业。北京大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开设考古专业的大学。在我上学的时候，名师云集，这使我得到了考古学系统的学习和专业的训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

说，我的考古经历起步于大学时代。当然，在学习考古学的同时，我心有所念的仍然是古文字学，并师从高明老师系统学习。我是1978级的考生，1982年毕业，那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自恢复高考后第一次接收应届毕业生。当时考古研究所夏鼐所长很重视这件事情，亲自到北京大学选人，我有幸被选中。记得在离开学校之前，严文明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家里对我反复叮咛，意思是说我是自“文革”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第一位去考古研究所工作的学生，要给北京大学争光。毕业后我就来到考古研究所工作至今。

问：也就是说对古文字的热忱促使您跨进了考古领域的大门。那么您是如何看待古文字学与考古学之间的关系？

冯：我觉得，考古学和古文字学是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古文字学不仅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更是考古学的研究基础和诠释方法。古文字的史料价值对考古学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这种意义是超乎其他非文字材料的。以商代为例，如果我们想重建商代的历史，主要靠什么？普遍认为依靠传世文献，但很多传世文献经过了后人的整理，其中也留下了后人的理解和改窜，不一定准确。而从地下发掘出土的甲骨文、金文、陶文、石刻等文字材料则直出先人之手，因此也就成为最真实、客观的史料。拿殷墟来说，我们都知道今天的河南安阳小屯及其附近是晚商的王庭，史称殷墟，但这个结论在今天是如何被证明的？是靠那些挖出来的陶器、铜器或其他的墓葬、房址吗？不是，主要就是靠甲骨文。甲骨文里记载了商王世系，其与《史记·殷本纪》所记载的商王世系基本一致，所以才证明了那里是殷墟。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甲骨文的发现，那么安阳到底是什么“墟”，恐怕到今天也还会有争论。

考古学是获取和佐证古文字学的手段。考古学是什么？它是利用古人留下的实物材料，如古代的遗迹和遗物重建历史的学科，这些材料当然也包括古代的文字史料。通过科学的考古发掘所提取的材料，不仅年代、地层都很清楚，而且还会有与古文字材料共存的其他遗物，如铜器、陶器、玉器等，这些伴出遗物对我们理解古文字材料很有帮助，所以我们又说考古学还有佐证古文字学的意义。

事实上，通过考古学与古文字学的密切关系，我们也能看出在中文系学习古文字和在历史系学习古文字的不同。我之所以没有选择在中文系学习古文字，是因为中文系只是把古文字看成一种文字材料，而在历

史系的考古专业中学习古文字，则是将古文字作为解决史学问题的一种方法。

二、析学术之要

问：您从事考古研究这40多年来，最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有哪些？

冯：如果总结一下我自己的工作，应该有这么几点。第一项工作就是对古文字的全面研究，这是我后续所有工作的基础和前提。第二项工作是系统重建了商周年代学框架。第三项工作是创立了中国天文考古学的学科体系。第四项工作是提出了中国文字起源的“夷夏两源”理论。第五项工作是提出了天文作为文明之源的观点。这五项工作其实是一脉相承的，每一个前项成果的取得都为后一项新的研究工作铺路。说起来有些惭愧的是，我的田野水平并不高。考古学主要是做田野工作，而我更多从事的是案头工作。

（一）天文考古创学

问：您刚刚提到的第一项工作，也就是您对古文字的研究都包括哪些内容？

冯：我最初从事的是先秦古文字学研究，以及从古文字入手对先秦历史与先秦考古的研究。开始的时候我只专注于古文字的考释，争取将不认识的字正确地识读出来。然而识字就不可能不关注同时代的器物和历史，由此便逐渐意识到，识读文字其实也有着学术意义和学术价值的不同，如果能通过认识一个字从而揭示一段历史，这种研究就更有意义。因此古文字的研究并不仅仅是认字，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对文字的研究解决历史问题。而研究历史就必须关注古代的制度 and 思想，这些问题不可能仅限于一朝一代，上有源，下有流，这就要求将研究的领域扩大。我开始主要以商周时代的历史和考古为研究对象，后来不断拓展研究范围，时代向前上溯到新石器时代，向后则延伸到秦汉时期甚至更晚，研究的问题也从古文字学、考古学和历史学逐渐扩展到年代学、民族古文字学、古代思想史和科技史，尽量对古史问题进行更全面和更多角度的思考。

总体来说，我在古文字学领域的研究包括：利用古文字材料，综合考

古和古文献史料系统研究上古历史和考古学问题，不仅重建了六书理论，而且对上古制度和思想史问题进行了广泛探索。古文字学的研究工作不仅是我学术生涯的起点，更是串联各项研究工作的纽带。

问：那么您是如何从古文字学入手重建商周年代学的？

冯：我研究商代甲骨文，经常会被卜辞所记载的月历所困扰，比如甲骨文记载了商代的一月或十二月发生了什么事，那么商代的一月或十二月与今天历法的一月或十二月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如果不一样，那么又相当于今天的什么时间呢？很明显，这个时间搞不清楚，月历所系的史实就无法解释。1984年，我在研究甲骨文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如卜辞见有：“[王]大令众人曰荔田，其受年。十一月。”从内容看，我们可以获得三个信息：一是“王”和“众人”，他们是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二是“荔田”，这是一件具体的行为；三是荔田发生的时间，也就是殷历的“十一月”。那么问题来了，“王”指商王，这一点没有疑问，但“众人”是什么身份的人？“荔田”在讲什么事情？“十一月”又相当于什么节气？

当时对这些问题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众人”是奴隶，那么“荔田”就只能是指农田耕作，如果是这样，对殷历十一月的理解就非常关键了。假如以史传建丑的殷历为原则，十一月则相当于今天农历的十月，也就是自立冬到大雪节气的一段时间，此时气候转寒，地已封冻，不是农作季节，又岂能耕作？于是又有意见认为，“荔田”是种植冬麦，那么商代有冬麦的种植吗？文献学的证据并不支持这种看法。历史学研究并不是说我们把今天熟悉的某种场景，无条件地复制到古代就可以了。既然“荔田”解释为耕作或种麦都讲不通，另一种观点就需要考虑了。有学者将“荔田”解释为祭祀田祖，祭田祖是重要的祭祀活动，那么作为行祭主体的“众人”，其身份就不可能是奴隶，而应是奴隶主或其他什么人，这当然直接涉及对“众人”身份的理解，甚至关系到以“众人”证明商代奴隶制存在的结论是否正确。

对于一条卜辞，两种不同的理解却天壤之别。两种说法的是非如何判断？关键就取决于我们对殷历“十一月”究竟属于何时的把握。假如我们把商代的历法问题解决了，商代的十一月相当于今天的什么时间考察清楚了，系于这一历月的事实属于什么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所以我当时立志，一定要根据甲骨文资料重建商代的历法。

我研究殷历问题当然也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商代的历法在当时并不是因为不重要而没有人研究，而是太难了所以研究的人不多。董作宾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研究殷历的学者之一，其创作的《殷历谱》对我的研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殷历谱》是他倾注了毕生心血的成果，但是不能不说，囿于时代的局限，当时的发掘资料还不丰富，甲骨文的整理工作也不尽完善，天文计算更属初步，这些都直接影响了他的研究工作，以致得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然而董作宾所开创的以卜辞月食而定天文年代，并以此建立殷历体系的研究方法仍是科学的，这对我的研究工作大有裨益。

到我思考殷历问题的20世纪80年代，相较于董作宾的研究已经过去了40年，这时的甲骨文整理工作早已取得了很大进展，天文计算的精度也有了巨大提高。就甲骨文的月食记录而言，他当年所能看到的月食卜辞资料还十分零散，所以存在将同一次月食当作不同的月食并分别考证年代的情况。其后学者发现董作宾所认为的两次不同月食实际指的却是同一次。到80年代，我们已经有能力确切地梳理甲骨文记载的五次月食，如果这五次月食发生的时间都能考证出来，那就意味着我们可以确切地建立起商代历法的五个标准时点，同时再根据月食卜辞所记录的殷历月份，以及与月食卜辞同版所见的殷历月份，考证出殷商历法的岁首和月首，从而解决殷历研究中这两个最关键的问题，进而重建殷商年代。确定了殷商历法的岁首，殷历各月的时间与后世建寅历法的对应关系也就一目了然了，而系之于相应历月的历史事实也就有了合理解释的基础。当然，解决殷历问题还必须同时关注商代的农业和气象问题。

总之，殷商历法的研究难度是非常大的，但是它对重建殷商历史的学术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蔡美彪研究员曾对我说过：“学术问题的难度越大，学术价值也就越高。所以要勇于攻克难题。”因此在我心里，学术问题逐渐没有了难易的区别，只有必要与不必要的不同。必要的学术问题，即使再难也要攻克。

问：在天文考古领域，您不仅完成了天文考古学科从0到1的创设，而且还实现了这一学科从1到2的发展，对于推动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完善和学术体系的创新具有深远意义。您刚才提到，您的这些研究都是一脉相承的，那么您是如何从重建商周历法到逐步搭建起中国天文考古学这一学科体系的呢？

冯：学术研究似乎总有些机遇，为了重建殷商历法，我当时特别关注

古代的天文历算问题，因而也就形成了对天文问题的敏感判断，这直接决定了后来我对西水坡天文星图遗存的认识。而对西水坡45号墓的研究又使我最终认识到，天文实际就是中国文化的源，要想从本质上把握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和发展脉络，就必须从天文入手，必须了解古代的天文学和宇宙观，所以也才有了我开创中国天文考古学学科体系的思考。

1987年6月，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时期墓葬的发现，成为我开启天文考古研究的直接动因。当时从濮阳传来的消息是发现了蚌龙，后来我看到了照片，墓主人东、西两侧不仅有蚌龙，还有蚌虎，我意识到，这应与中国天文学的四象有关。我对天文学的史料比较熟悉，所以也就有了这种敏感。当然，仅凭龙、虎是难以说明其为四象的。到了1988年，《文物》第3期发表了西水坡遗址的发掘简报，我看到简报上面45号墓的平面图后，一眼就认出了位于墓主人脚下的图案表现的就是北斗星，这意味着与北斗星共存的龙、虎，其必然组成的是一幅天文图，而且这幅天文图与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二十八宿漆箱的盖面星图完全一样。之后我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写好了一篇题为《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研究》的论文，交给了《文物》杂志，在1990年第3期发表了出来。论文一经刊发，引起了学界较大反响。文中涉及了二十八宿的起源，这个问题不仅为中国学者所关心，更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课题。过去夏鼐根据战国初年曾侯乙墓漆箱二十八宿的星图资料，将中国二十八宿的形成时间上推到公元前七八世纪，然而西水坡墓葬的时代却已经到了距今6500年，这不仅将二十八宿的起源年代比以往的认识又向前追溯了三千多年，而且也成为目前所见二十八宿的最早物证，从而确切证明了二十八宿体系中国本土起源的事实。毫无疑问，这在人类文明史和科学史的研究方面都很重要。

这篇文章在中外学术界的影响超乎了我的想象，我也因此萌生了创建中国天文考古学学科体系的想法。下一步工作是从1990年到1998年，我用了八年时间完成了《中国天文考古学》这部学术专著。该书在2001年正式出版，标志着中国天文考古学这门新学科的形成。此后几十年，我不断拓展天文考古学研究的内容，加深论证古代天文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使中国天文考古学逐渐为学术界所认可和接受。如今从天文考古的角度思考问题，运用天文考古学研究方法从事研究，已经成为很多学者的自觉行为。

总而言之，我对中国天文考古学学科的创建，是从最初对古文字的兴

趣，拓展到对殷商历法和年代的研究，进而又从殷商历法深入到古代天文学的研究。这一创建过程同时也明确了中国天文考古学作为一门包含诸多学科在内的综合学科的属性，研究这门学科必然需要结合考古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和古天文学的史料和研究方法。如果让我去定义天文考古学，我认为它就是利用考古学资料解决古代的知识论和宇宙观问题，从而最终解决文明起源问题的一个学科。

（二）“夷夏两源”立论

问：您提出的关于中国文字起源的“夷夏两源”学说，为学界重新认识文字起源提供了全新范式。在传统“汉字一统”的学术语境下，您是如何通过古文字材料与考古实证，构建起这一文字起源理论的？

冯：这个理论的创立来源于我对山东邹平丁公龙山文化遗址出土陶文的研究。遗址出土的陶片上刻了11个文字，但这11个文字与汉字并不属于同一体系，所以用汉字是无法识读的。1994年，我发表了题为《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考古》1994年第1期）的论文，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习惯于利用甲骨文对读丁公陶文？甚至用甲骨文对读新石器时代出土的一切可能属于文字的材料？原因就在于长期受到了“大一统”观念的影响，以致人们始终认为上古文明同后世一样，文化是一统的，文字也是一统的。既然如此，那么用甲骨文对读研究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我的研究认为上古时期并非汉字一统，族群也非华夏一族，而是呈现为夷、夏两大族群东、西分治的格局，于是提出了中国文字的“夷夏两源”理论。

其实这个说法最早并不是我提出的，傅斯年早在1933年就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夷夏东西说》。他认为，中国历史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是很晚的事情，早期则呈现为夷夏东西交胜，夷夏分治的地理标志是太行山，太行山以东分布着东夷文化，太行山以西则为华夏文化。我的工作不仅以文字学证据证明了夷夏东西的事实，并且将东夷与今日川滇黔桂的彝族建立起了联系，证明东夷族群事实上就是今天西南诸少数民族的共同祖先。后来我又通过民族古文字学研究和天文考古学研究进一步完善了这一理论，结合古彝文解读了太行山以东地区出土的文字资料，同时也揭示了东夷文化的宇宙观，为东夷文明的存在提供了确凿的证据。比如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洛书九宫八角”图像，在新石器时代只发现于太行山以东的

东夷文化区，太行山以西的华夏文化区则绝无踪迹，而这种图像在今天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中却普遍存在，证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与新石器时代的东夷文化一脉相承。

问：您提出的“夷夏东西”这一中国上古文化格局，具体来说呈现出怎样的特征？

冯：概而言之，“夷夏东西”格局是指太行山以东是东夷文化区，太行山以西则是华夏文化区。东夷文化区包括了北起辽河流域，南到黄河下游，再南到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其典型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有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长江中下游的高庙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和良渚文化等，而古蜀地区的三星堆文化则是相对较晚的东夷文化。这些地区使用的文字属于古彝文系统，思想观念颇重天文数术之学，崇尚天地，并建有祭祀天地的坛坎，治有礼祀天地的精致玉礼器，凡此无不体现着东夷文化重视鬼神的传统。

与东夷文化相对的华夏文化分布于黄河中上游地区，典型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有仰韶文化、庙底沟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这些文化完全不见东夷文化普遍流行的重视鬼神、崇尚祭祀的风尚，用于通神的玉礼器也不发达，但非常重视宗族人伦，彰显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社会特征。事实上，氏族社会形态在东夷与西夏两域文化都已形成，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只不过华夏文化更看重氏族的尊亲伦理，而东夷文化则更崇尚祭祀通神，当然，祭祀的目的还是为了宗族的繁衍。夷夏文化的不同与《礼记·表记》所记载的夏商文化的差异若合符节。

若形成这种“夷夏东西”对峙的格局，必须具备一个客观前提，那就是夷夏两种文明的发展程度不相上下。然而，已有的史料对印证东夷文明的历史非常有利，其知识体系的创立与文字创造，都可以追溯到距今八千年以前，但对华夏文明而言，证据链还尚待完善。如果真如此，那么夷夏两域文化交胜对峙的形势将很难形成。显然，这种表面看上去的夷强夏弱的现象是不存在的。后来发现的湖北秭归柳林溪遗址中距今七千年前的早期汉字、秭归东门头遗址出土的八千年前的碑表等证据，将华夏文明的形成时间大大提前，终于使夷夏两域文明之间近三千年的差距得到了弥补。

确立了夷夏东西的文化格局，也就提供了审视上古文明的新视角和新方法。再谈中国文字的起源，就不能再是简单的汉字的起源，而应包括在

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华夏文字及非华夏文字的起源。同时，文字起源的“夷夏两源”理论还关系到如何看待上古文明和中华文明。我们说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从文字起源的角度看，这种多元一体的局面古来如此，这是中华文明的显著特点之一。

（三）己身文明建构

问：您建立的关于中华文明的己身文明理论，尤其是“天文作为文明之源”的创见，深刻影响了学界对中华文明本质的认知。您是如何定义中华文明的？

冯：今天无论是考古学、历史学研究，还是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普遍理解的“文明”内涵都是来自西文“civilization”的对译，因而会不自觉地以西方对文明的解读去解释中华文明，也就是所谓的文明三要素——城市、文字和金属器。“civilization”的词根“civil”是“公民、城市”的意思，所以城市是西方文明观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而城市是组织、规划城邦国家的核心所在，因此可以认为西方文明的核心就是国家。国家是什么？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而中华文明所讲的“文明”与“国家”根本就是两回事，中国古代文献中对“文明”和“国家”有着清晰定义。因此，国家不是衡量中华文明的标准，所以建立在“civilization”对译基础之上的对中华文明的讨论都是与中华文明的固有传统不相符的，当然也就不可能揭示中华文明的真谛。

既然中华文明所讲的“文明”与西方所讲的“国家”无关，那么如何从中国古代先贤的视角定义中国人自己的文明观就是我所做的工作。根据中国的古典文献，我重建了中华文明的己身文明内涵，并进一步归纳出中华文明的“三要三本”理论：第一是道德，道德为成人之本；第二是知识，知识为立身之本；第三是礼仪，礼仪是治世之本。

问：您又是如何从天文学视角发现中华文明的根脉的？

我之所以提出中华文明的源头在于天文，一方面源于人们基于天文学知识而进行的农学实践中形成的对文明的认知。中华文明发轫于农业，这意味着为决定农时服务的天文学成了最早诞生的古典科学。天文学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观象授时，它是古人通过对太阳、月亮、星辰等天体运行规律的观测，精准确定时间与节气时令的方法，这种方法不仅为古代天文学积累了观测数据，推动了天文仪器的发明和天文理论的演进，还直

接服务于农业生产。而立表测影是观象授时最常用的手段之一，古人通过立表测影发现，回归年中夏至日的精准回归、月亮朔望周期及四季更替等时间规律，历经千百年始终恒定，古人由此形成“至信如时”的观念，进而以时间的诚信特质为道德范本修养自身。

另一方面，天文作为文明之源的事实在古书中也表述得非常清楚。《易传》说：“见龙在田，天下文明。”龙星的回天运行决定着时间，通过观象授时，人们领悟到了“至信如时”的品德，由此形成了文德，成就了文明。

现在我们再回头看“三要三本”中的第一要素道德，可以说，古人以一个“信”字赋予了道德明确的内涵，而“信”的形成源于观象授时，时间的规律性成为诚信品德的具象化表达。显然，对天文学的研究，能彻底揭示中国古人从天文实践中提炼时间伦理，再以伦理塑造文明形态的“观天—悟道—成文明”的认知逻辑，而这种认知方式不也正是“究天人之际”的史学研究价值吗？

问：您觉得古人的这种道德观和文明观与今天我们所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什么内在联系？

冯：古人对中国核心价值观的总结，简洁地说，就是道德。再凝练的话，就是一个字——“信”。古人说，“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今天，我们仍然认为有德之人为君子，成人之道就是修德之道，修德便是修信，这是中华文明自古以来恪守的文明观。这种文明观可以说是形成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和最为本质的内核。

（四）中华文明溯源

问：您刚才提到，无论是古文字学研究，还是天文学研究，其最终目的都是在于重建中华文明的历史。那么经过您这么多年的工作，您认为中华文明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年代？

冯：我可以非常笃定地说，中华文明的历史至少已有八千年。

其一，汉字“文”字的创造即是典型的文明成果，其通过字形表现的乃是以道德修心，所以“文”字的本义不仅是文德，更是文明。这意味着“文”字创造的历史也就显示着中华文明形成的历史。今天我们已经发现了距今七千年前确凿无疑的汉字“文”字，不仅如此，同一件器物上出现了八个“文”字，其不仅与九宫空间配合设计，而且以“文”字充为四维，体现了以道德为国之四维的传统“绳治思想”，同时八个“文”字与

八方空间的特意组合，也具有八方天下无处不文明的喻义，这种观念与后世《易传》“天下文明”的思想一脉相承。很明显，这种文明观早已摆脱了文明初创时期的朴素思考，意味着中华文明的起源年代还可以向前追溯，这就是我提出中华文明的历史至少已有八千年的主要史实根据。

其二，刚才我提到中国文字拥有“夷夏两源”，汉字是华夏文化使用的文字，而古彝文是东夷文化的文字。已有的史料能够印证东夷文明在距今八千年前甚至更早就已出现，可以说，夷夏文化都已具有了至少八千年的文明历史，其文明的发展程度是不相上下的。当然，新材料的出现还可能继续改变和丰富我们的认识。

其三，从天文学角度看，天文乃文明之源。观象授时促成了古人文德观的形成。换句话说，没有古人长期不懈的观象授时，也就不可能产生文德思想，也就不可能形成文明。考古资料显示，最早的候气律管出现在九千年前，而测影定时也已有八千年的历史，这说明古人自那时就已建立起了以对空间和时间有效规划为核心的早期知识体系。可以相信，至少在八千年前，观象授时制度已经完善，这显然为文德观念的形成乃至文明的诞生准备了条件。

三、传薪火之炬

问：多年以来，您一直坚持在科研和教学第一线，为中国考古学界培养了很多优秀学生，同时还通过各种学术讲座将您的研究心得传播给社会大众，我觉得这也是一项很重要的贡献。您是怎么看待您在学术传播这一领域所做的工作？

冯：近十几年来，我在公共文化的传播方面确实做了一点事情，若言“贡献”，实不敢当。其实在2013年以前，我主要是埋头做自己的研究，与社会的接触不多。

转变缘起于2012年，当时考古研究所与上海方面联合举办了一系列学术讲座，所里要我去讲一次，结果反响很好，于是上海方面希望我能开设个人专题系列讲座，被我谢绝了。我自己的愿望还是踏实做学问。结果上海方面的同志很坚持，专程来北京说服我。我也作了一些反思，农民种植庄稼，工人制造产品，都是对社会的贡献，我作为一名学者，只有将我的心得讲给大家，让社会公众了解真正的中国文化，进而认同这个文化，

从而增强个人的文化自信，最终提升民族的文化自信，这不就是我对社会应有的回馈吗？于是从2013年至今，每年的讲座少则几十场，多则上百场，我都尽力而为。这种情况直到2020年疫情时才有所变化，即使如此，仍然每年有三四十场的讲座。此前，我认为研究是做给国家和自己的，但现在我觉得研究更应该是做给公众和社会的。所以只要我还有精力，就尽量满足大家对文化的渴望和需求。

问：最后想问问您，对于未来中国考古学学科的建设有什么建议？对于考古学的后辈们有哪些期待？

冯：我历来主张，学者是学科建设的关键，一门学科的建立要靠学者的学术积淀与开创性探索，一门学科的发展要靠学者治学的态度和高度。这些都要靠脚踏实地，靠长期的思考和积累。老一辈学者提倡坐冷板凳，淡泊名利，这样才能写出精品力作。如果杂念太多，欲望无穷，怎么可能踏踏实实地潜心研究！创建学科，创立学派，都要通过艰苦努力，没有捷径可走。古人讲王道无近功，做学问更不能急功近利。中国考古学学科的建设只能靠中国考古学研究者的自我完善。

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考古学绝非单纯的学术研究，其根本使命在于为重建中华文明的信史服务。而中华文明的信史作为塑造健全民族意识的根基，决定了中国考古学必然肩负着重建文化自信与民族自信的历史重任——这既是时代赋予中国考古学的使命，更是每一位考古学研究者不容推却的责任。唯有将学术追求与民族命运深度融合，从“为学问而学问”转变为“为民族而学问”，才能使学术研究真正扎根中华大地，使学科建设彰显中国气派，传递文化自信。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口述访谈录”（项目编号：LSYZD21013）阶段性成果

〔作者蒋雁喃，1995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讲师，馆员；张凯，1998年生，曲阜师范大学法学院硕士生〕

（责任编辑：任会斌）